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hkdv7c37>

Re-examining the "Three Passes" and the "Guannan Area" in the Liao-Song Confrontational Framework

再论辽宋对峙格局中的“三关”与“关南地”

Jiarun Li^{a,*}

^a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Keywords:

Liao-Song Relations;
Three Passes;
Guannan Area;
Geopolitical Pattern

关键词：

辽宋关系；三关；
关南地；地缘格局

Abstract: The "Three Passes" and the "Guannan Area" were not only uniqu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cepts within the Liao-Song confrontation pattern but also epitomized the geopolitical rivalry,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defense systems, and the models of border governance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Their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reflects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grarian regime and the northern nomadic power from the 10th to the 12th centuries. The contention over the "Three Passes" and the "Guannan Area" essentially represente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cute conflict between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strategy of the Khitan regime and the northward unification objective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 Given the fundamental opposition and intense conflict inherent in their strategic goals, such contradictions could hardly be thoroughly resolved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s. This structural North-South conflict not only shap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10th–12th centuries 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geopolitical-military strategies and the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摘要：“三关”与“关南地”不仅是辽宋对峙格局中特殊的历史地理意象，更集中体现了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军事防御体系构建与边疆治理模式；其发展脉络反映了10-12世纪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间复杂且动态的互动关系。双方围绕“三关”与“关南地”的争夺，实为契丹政权南下战略与中原政权北上一统目标间尖锐矛盾的外在表现。因双方战略目标根本对立且蕴含激烈冲突，此类矛盾难以通过政治协商彻底化解。这种南北结构性冲突不仅塑造了10-12世纪中国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更深刻影响了双方的地缘军事战略及经济文化交流模式。

10世纪以降，中国北方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契丹逐步取代突厥、回纥等草原势力，崛起成为掌控北方草原的游牧政权。与此同时，中原地区长期分裂动荡，短命政权更迭频繁，直至北宋实现局部统一，但始终未能

恢复汉唐时期“大一统”的疆域。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政权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这种对峙并非静态的疆域分割，而是伴随持续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博弈，导致双方疆域呈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多地数度易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873419469@qq.com

手，使得燕云地区、河北及河东北部都边境缓冲地带，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疆域归属频繁变更。以河北为例，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构成的“三关”及其以南俗称“关南地”的狭长区域，成为边境与边界标识与维系南北和平的关键性战略枢纽。

“三关”与“关南地”不仅仅是辽宋双方地图上的边境标记，北宋依其作为北疆防御的前置，辽人将其视作占据地缘主导的关键一环。围绕着这片土地的归属与防御，宋辽双方展开贯穿始终的地缘博弈，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东亚地缘问题的切入点。学界就这一问题有所关注，朱小琴[1]与白雪[2]详细分析了宋辽“关南争地”的相关内容，明确“关南地”在辽宋关系中的重要性。廖寅[3]详细考察了关北“两输地”的相关问题，并对“两属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探讨。郭志伟[4]就“关南争地”事件分析北宋仁宗朝为防御北方契丹威胁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为维持宋辽中后期的和平打下基础。张静[5]将辽宋边界进行了确定的划分，指出受两国“心理边界”差异、“禁地”“两属地”模糊的影响，但最终边界的划定仍是由两国国力所决定。洪纬[6]关注到“三关”在契丹南下历程的重要性，契丹夺取三关不仅能再次打开契丹“略地至河”的通道，还能扼住宋军北上的咽喉，帮助契丹重夺在河北战场上的战略优势。何天白[7]指出宋辽河北疆界具有两重性：清晰地区隔双方对边地的统治权，略显模糊地区隔双方对边民的统治权，两种状态相反相成。本文立足前人研究成果，拟进一步探讨“三关”与“关南地”对辽宋地缘格局的影响，略陈管见。

1. “关南争议”缘起与“关北”两输地

辽宋关南争议地域，源自南北政权边界变动频繁引发的宣称与实际控制混乱所展现出的边界矛盾。先是，后晋石敬瑭“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献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8]，以换取辽对其反叛后唐的支持。燕云之地归属契丹，其地战略位置及其重要，“夫燕云，王者之都，一日缓急，便可得万众，虽有不虞，不敢越关岭，踰诸司而出也。形势既定，本根既固，则太平可期。”[9]此地作为中原北部防御北方民族南下的军事缓冲区以及链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枢纽地之一，深受历代王朝的重视。后至后周显德五年至六年（辽应历八年至九年，958—959年）边界的第二次大幅度变动，辽应历九年夏四月“周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10]另外，辽之宁州亦失于此次后周北伐，“石晋幽州乾宁军，入辽后置宁州，为刺史州，应历九年失于后周，其地于宋复建乾宁军”[11]。此地居

于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南，称关南之地。“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12]这一记述虽略显夸张，但一定程度反映此时辽对燕云地区的掌控并非十分稳定，甚至民众对契丹的认同十分微弱，仍心系中原政权。

据《契丹国志》载，关南之地的丢失，于辽穆宗看来十分消极，“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其神气怠缓，不恤国事如此。”[13]笔者以为其表述恐非信史。所谓“汉地还汉”观点，应置于应历年年至九年辽与周边政权关系的地缘政治大环境以及穆宗本人、契丹统治集团、契丹军事战略等诸多因素考量，即使穆宗在三关丢失后有类似说法，“也只能理解为丢失三关后为脸面计的掩饰之词，而非出自衷心，并不能作为其持草原本位政见之证据。”[14]与其他文献所载穆宗行为，颇有言行不一之嫌。在关南之地丢失后，穆宗“如南京”[15]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保卫幽云的对策。张藏英曾仕契丹，对契丹以及燕云尤其是三关之地颇为了解，且具有一定的威望，遂有了从世宗征契丹事，藏英“单骑往（瓦桥关）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非汝敌也。不下，且见屠。’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16]，在后周进攻瓦桥关之战前往招降，取得成功。后周占领关南之地后，在加强对新夺地域的控制的同时，继续向北巩固战果，“己酉，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是日，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破契丹数百骑于瓦桥关北，攻下固安县。”[17]藏英破契丹于瓦桥关北，此时瓦桥关已成为后周领土，这支契丹骑兵应是探马或是先锋部队，说明穆宗以及契丹统治集团并非单纯消极放弃关南之地，而是有尝试收复。张藏英破契丹数百骑于瓦桥关北事，《宋史》于时间和事件前后逻辑记载有所不同，张藏英随从周世宗“征瓦桥关，为先锋都指挥使，败契丹骑数百于关北。下固安县，又改关南排阵使。”[18]元朝史臣将此事置于藏英从征瓦桥关时，但藏英似是通过单骑招降夺取瓦桥关，几乎不可能在契丹军众从北门退出时诈击之，这不符合战争逻辑，更难以符合实际情况。但奈何主客观因素，只能作罢。此时契丹所败之快，主要是缘于主观因素限制，其一，南京主帅萧思温的平庸乏才，不能有效节制幽云地区的汉军守将；其二，幽云地区民望、民心还在中原，当地汉军对中原的认同尚在契丹之上。[19]然关南之地便成为南北朝边境摩擦的高发区域，历史遗留的边界划分模糊不清，使得南北势力在这片土地上的利益诉求相互交织、激烈碰撞。此地即河间地区，清人言其地缘“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

[20]，处南北要冲，为北上南下最总要之要冲。中原王朝与契丹对此地的争议，成为贯穿辽宋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宋辽边境有一个双方主权采取分权治理的共管区域，可以称为两输地，谓“一地属两境四县”，其地民户称为两属民。四县，即宋方的归信、容城，辽方的归义、容城。[21]此为巨马河穿过之故，原属归信、容城“民居在巨马河南，侨治新城”[22]，两输地的存在，似是宋辽不必直面重大疆土矛盾，即可维持河北疆界争议，意在避免彻底确定河北疆界，以待后图。[23]笔者以为，两输地现象是辽宋领土与边界争议地区居民归属及治理的非常态化表征，核心主体两输户，其既是辽宋政权间的政治筹码，亦是地缘博弈的重要工具。这一现象与复杂的地缘格局、多元的民族认同体系以及民众的生存策略选择交织相映。

为应对契丹的军事压力和领土诉求，宋廷君臣针对关南之地有充足应对措施。宋初便构筑一系列驻守要地的军事部署，“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以拒北契丹。”[24]边境守备异常稳定，“李汉超守关南十七年”[25]，李德政任关南兵马都监时，十分注意边境管理，“幽都南际，河间北壤，守方之要，慎简为难。至则远斥堠，审号令，养士如子，戢军无私，威声飙驰，亭障山立。绝寇边之虏，有狎野之农，而郡之大事，亦皆听命，千里之内，若指掌焉。”[26]对这一交通要道和北方边境防御体系的重要战略缓冲地带，在于边防警戒、军队建设、情报收集、地方事务等方面有高效的管理能力。此外，北宋曾在边境广修陂塘，同时尝试将这些水域改造为稻田，以农养边，以水阻兵，何承矩面对契丹扰边，上疏说可以尝试利用现有水系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屏障，以遏制敌骑的快速奔袭，“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闻，即播为稻田。……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休息民力，以助国经。”[27]但实际上，在某些特定季节，连片的水系所起到的牵制作用十分有限，“穷冬冰坚，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28]，受自然环境限制，“夏秋可徒涉，遇冬则冰合，无异平地”[29]但却很好的形成了一条自然边界，用以划分南北争议地域。

2. “关南”地域困境下辽尝试突破行为

纵观澶渊之盟以前的辽宋冲突，契丹南下入侵宋境一般避开三关地区，由西段南下，[30]从三关地区防御薄弱

处返回“景德以前，北敌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后东出雄、霸之间。”[31]这缘于三关地区形成的御边体系使得北方骑兵甚是头疼。另从吴淑的《御边策》中亦可窥见，“北边地势，狼山以西，连山为限，旧有兵寨，守其险阻，不必增备。狼山以东至于海，不过数百里，皆须防御。然自易、定以东，有界河为阻，未易涉渡。独界河以西，狼山以东，不过百余里，最为要害，戎人所入，常在此矣。”[32]狼山（今狼牙山）地处太行山北端东麓，属太行山余脉，地貌复杂，以西依托天险，“连山为限”，山脉构成天然屏障；以东为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界河以西百余里便是防守薄弱地区，是辽军南下的首选之地。

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太后萧绰与圣宗率军深入宋境，抵近澶渊的路线亦绕过三关，“丙寅，辽师与宋兵战于唐兴，大破之。丁卯，萧挞凛与宋军战于遂城，败之。庚午，军于望都。”[33]面对这次契丹南伐，宋真宗君臣就战争动机与议和问题进行分析，这反映了辽宋双方在军事对峙与外交博弈中的尴尬处境，真宗曾言：

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34]

在真宗看来，辽朝的求和诚意似有所不足，可能会在议和后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辽方的核心诉求有可能会涉及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宋方态度坚决，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容有失。实际上，辽军在绕过三关后的行军确是直入关南地区，此事引起宋人的注意，“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35]然而事实却是契丹因瀛州难以攻克，遂调整进军战略，“冬十月……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36]，这是出于进攻成本过大的现实考量，“初，契丹自定州帅众东驻阳城淀，遂缘胡卢河踰关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37]

宋辽澶渊议和时，契丹便寻求借此索回关南地，以获取战略主动，契丹使者韩杞奉书往宋，“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辅臣等请答其书，言：‘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度。’”[38]后宋辽使者还，“契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

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39]笔者以为，本次和约的签订，辽方的主要目标并非获取财物，而是借机索回关南地，全面瓦解宋方的北方防御体系，获取军事主动权，但出于孤军深入与双方势均力敌的战争困局，双方不约而同选择保留争议的基础上获取利益。如盟约原文，便是从维持实控疆域而并未有所划界，“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穡，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40]换言之，澶渊体系在宋辽军事对峙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建构起包含多层次互动规则的政治契约，是双方势力动态平衡的具体体现，这为双方保留了战略调整空间，这一余地给辽宋随后的边界摩擦提供借口与动机。

澶渊盟约为辽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回报（岁币），使其维持与宋和平相处这一现状的积极性远比宋要高。[41]如订立盟约的次年，“安肃军言部民数辈，私至北界易州，州将执之送还。诏谕边臣，如北人擅至封内，亦登时执送”[42]，宋境百姓私自越界，辽方严格进行执送处理，这是遵循盟约的体现，也是有意避免可能因人员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北宋接辽境的边地，地方官员于盟约订立后次月便有请旨以加固边防行为，“岢岚军请修旧方田，火山军请筑月堤，上以违契丹誓约，不许”[43]。二者处于河东前线，虽一为“修旧”、一为“新筑”，但均涉及边境军事防御能力的强化，恰是盟约禁止范畴。实际上，辽对宋亦有试探：

雄州言，容城县状称戎人大驱马越拒马河放之，其长遣人持雉兔来问遗，求假草地。上曰：“拒马河去雄州四十余里，颇有两地输租民户，然其河桥乃雄州所造，标立疆界素定，岂得辄渡河畜牧，此盖恃已通和，谓无间阻，可亟令边臣具牒，列誓书之言，使闻于首领，严加惩戒。况今欢好之始，尤宜执守，不可缓也。”[44]

此次辽人越境似是以民间行为，是边民进行的一次边界试探，规模较大，背后同官方有嫌与否已难以考证。真宗所言“标立疆界素定，岂得辄渡河畜牧”表明北宋对拒马河一带的疆界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长期的认知，“列誓书之言”即是维持战前之边界状态，誓书虽无明确规定划分，但北宋认为疆界既定，不容随意侵犯。盟约后，凡契丹使臣入境，第一站便是“至白沟驿赐设”[45]，而辽方亦有于边境“契丹置馆于拒马河北，以候朝使。”[46]

3. “关南”地域的特殊战略价值

关南之地，以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二州为主，其作为幽州与河北地区的“南北枢纽”在军事防御与经济供给中占据核心价值，自唐迄宋的战略地位突出，清人对此有总结：

唐藩镇之患，卢龙一道称最强者，以瀛、莫南下，易定、镇冀不得不避其锋也。朱全忠欲吞幽州，先争瀛、莫。及晋人取燕，既得瀛、莫，而刘守光不旋踵亡矣。石晋以瀛、莫入契丹，河北之畔，曾不踰时，甚且饮马河津，毒流中夏。周世宗惩其弊，力战以复关南，戎夏之防，藉以少固。宋人因之，兴塘泺，列军屯，常为重镇。……宋人屯田关南，岁收数倍。且地滨沧海，盐鹾之利，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供亿，皆取给焉。诚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47]

此地兼具陆路与水路优势，唐代后期，瀛、莫已是“舟车通利”之地，中原物资经此转运至幽州，控制此地对南北政权战略防御均有决定性作用。北方政权以瀛、莫二州作为深入中原的跳板，而南方政权依靠瀛、莫二州构筑边境防御的核心枢纽。元人认为，“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逾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48]苗润博指出《兵卫志·兵制》部分涉及南伐内容源出陈大任《辽史·兵志》旧文，属于北朝文献系统，“今本《兵卫志·兵制》实际上是元朝史官对源出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原始资料加以拼接、杂糅的产物”[49]。此语是元人对编撰《辽史·兵卫志》的总结话语，其中所涉及与宋关系、宋境地理等方面显得颇为混乱，“逾三关，聚议北京”是对前文《兵制》中“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以及“三路往还，北京会兵”[50]的概括。所谓“三路往还，北京会兵”相关描述似不符合契丹南下路线，倒与宋方北上与战略防御重点有异曲同工，有关《兵卫志·兵制》所载史实辩证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留待后考。但卜凡考宋辽战争交通，指出自河北中部雄州、霸州间道路仅乾亨二年、统和四年与宣和四年，以及雍熙北伐时的几次使用过。[51]“大河在前，三镇在后”则是元人对辽南下进军的反思。其中涉及“三镇”者，检《辽志》并无明确指向，故而推测如下：其一，“三镇”即“三关”，三关缘边，防御为主，远离大名府，对辽行至此地威胁较小，且不符合行文逻辑，前文言“三关”，后句何必改为“三镇”，似应有所特指。其二，“三镇”为靖康年间所欲割让女真之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迎献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地以和、且言内禅”[52]，但太原在河东，与河北战事裨益不大，可能较小。

其三，代指“河朔三镇”，河北防御范围同唐末河朔三镇防区重合甚多，但时间过远且宋时已较少提及，应不符。其四，是为宋于河北驻屯之三个重镇，即高阳关路、真定府路、定州路三镇，“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海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干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洛、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53]笔者以为，此处三镇，即为协控北京大名府的高阳关路、真定府路、定州路三镇。

开运三年九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沟河泛滥，水入城郭及损害秋稼。……今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际。戎王已归本国，若闻南夏有变，地远阻水，虽欲奔命，无能及也。”[54]此次大雨，造成“瓦桥已北，水势无际”，三关以北出现了天然隔绝北方民族骑兵南下的障碍。再者，关南之“塘泺”，是宋廷充分利用原有区域自然地理特点，开挖渠道，修筑堤坝，开辟水口，导引水源，调控水位，将各河流的水源几乎全部导入了各区湖泊，形成历史上冀中平原上最大的湖泊系统。[55]也就是说，此地地势远低于周遭，遂有宋初何承矩“水利屯田”构建“水长城”，以达到“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畾，即播为稻田。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止留城守军土，不烦发兵广戍”[56]这种以水代兵的效果。是故，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夺取“关南地”并非简单对土地和“大一统”的追求，其作为河北地区战争战略主导权的归属，是宋兴两朝对宋经略的主要矛盾之一。

上文已述，在某些特定季节，连片的水系牵制军事十分有限，但对契丹贵族而言，连片的水系会出现遏制或阻碍军队行进的可能。早在景宗朝，时任南京留守高勋提议开垦城郊洼地种稻，这一行为触动了契丹贵族对军事防御的敏感神经，耶律昆云：“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57]使本欲同意的景宗因军事和维稳的大前提而被搁置。

4. 结语

立足历时性考察视角，“三关”与“关南地”作为辽宋南北对峙格局下河北边境前线无可替代的战略要冲，其地缘价值并非静态恒定，而是随双方政权实力消长、军事战略调整与政治博弈进程不断演变，始终承载着双重战略功能。从空间维度看，随着“幽云”地区的易主，该区域愈加成为中原农耕政权抵御契丹南下的门户，宋廷在此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修缮塘泊、构筑堡寨。这亦成为契丹政权南向渗透、牵制中原的战略前置。宋初，太祖、

太宗时“三关”与“关南地”因涉及燕云十六州的领土争议，成为辽多次南下的目标；至真宗景德年间澶渊之盟签订后，虽双方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但该区域中仍存在“两输地”作为边境的缓冲地带，双方进行互市监管与情报侦察。换言之，“三关”与“关南地”的战略地位，始终是辽宋政权地缘利益冲突的集中投射，亦是双方军事力量部署的核心锚点。这深刻折射出10-12世纪中国南北政权间战与和的动态平衡逻辑，作为辽宋对峙的历史符号，仍为后世研究政权间的边疆治理与地缘博弈提供了典型样本。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朱小琴(2000). 宋辽“关南地之争”.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02):61-66.
- 白雪(2019). 辽宋“关南争地”事件探讨.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廖寅(2013). 北宋时期白沟的生活世界. 社会科学辑刊. (03):142-147.
- 郭志伟(2021). 北宋河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关南地之争”为中心. 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 (01).42-57.
- 张静(2021). 画野分疆——试析辽宋边界演变. 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 (01).58-72.
- 洪纬(2022). 10世纪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何天白(2023). 宋辽河北疆界的两重性. 史学月刊. (06): 17-26.
- 叶隆礼(2014). 契丹国志. 中华书局. 19.
- 郝经(2018). 郝经集校勘笺注. 三晋出版社. 2599.
-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83.
- 余蔚(2017).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修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328.
- 薛居正(2016). 旧五代史. 中华书局. 1835.
- 叶隆礼(2014). 契丹国志. 中华书局. 62.
- 林鹄(2018). 南望：辽前期政治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86-200.
-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83.
- 司马光(1989). 淳祐通志. 中华书局. 40.
- 薛居正(2016). 旧五代史. 中华书局. 1835.
- 脱脱(1985). 宋史. 中华书局. 9291.
- 郑毅(2019).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 东北大学出版社. 50.
- 顾祖禹(2005). 读史方舆纪要. 中华书局. 550.
- 廖寅(2013). 北宋时期白沟的生活世界. 社会科学辑刊. (03): 142-147.
-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566.
- 何天白(2023). 宋辽河北疆界的两重性. 史学月刊. (06): 24.
-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385
- 蔡戡(1986). 定斋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598.
- 徐铉(1986). 骑省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1.

27. 脱脱(1985). 宋史. 中华书局. 14099.
28.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3648.
29. 脱脱(1985). 宋史. 中华书局. 2362.
30. 林鹄(2018). 南望：辽前期政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52.
31.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3648.
32.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087.
33.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174.
34.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69.
35.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78.
36.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174.
37.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79.
38.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88.
39.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90.
40.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299.
41. 杨浣(2010). 辽夏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 281.
42.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345.
43.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311.
44.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325.
45.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1342.
46. 徐松(2014). 宋会要辑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9737.
47. 顾祖禹(2005). 读史方舆纪要. 中华书局. 550-551.
48.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489.
49. 苗润博(2020).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文献. (03): 95-96.
50.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452、453.
51. 卜凡(2020).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35(03): 104-105.
52. 李心传(20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中华书局. 11.
53. 李焘(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3948.
54. 薛居正(2016). 旧五代史. 中华书局. 1298.
55. 邓辉, 卜凡(2020). 历史上冀中平原“塘泺”湖泊群的分布与水系结构. 地理学报. 75(11): 2332-2345.
56. 脱脱(1985). 宋史. 中华书局. 9328.
57. 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1450.